



田野·社会丛书

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行 龙 编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非外借

田野·社会丛书第二辑

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行 龙 编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 行龙编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田野·社会丛书)

ISBN 978-7-100-16227-2

I. ①以… II. ①行… III. ①水利史—山西②社会史—山西 IV. ①TV-092②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4858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田野·社会丛书)

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行 龙 编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6227-2

2018年8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2

定价: 63.00 元

《田野·社会丛书》总序

走向田野与社会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

行 龙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总是不断出新，五花八门。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引进、接受了太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派史学、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也在不断地前行。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地听到或看到对西方理论概念盲目追求、一味模仿的批评，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概念理论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响起。

这里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却不是什么新的概念，更不是什么理论之类。至多可以说，它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和实践。

“走向田野与社会”付诸文字，最早是在 2002 年。那一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 100 周年，校方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此书有一个副标题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其实是我和自己培养的最初几届硕士研究生撰写的有关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论文集。2007 年我的另一本书将此副题移作正题，名曰《走向田野与社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忆记 2004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山西大学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题的讲座中谈到，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

其实，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也是一份值得深切体会和实践的学术资源。我们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他游历名山大川，了解风土民情，采访野夫乡老，搜集民间传说。一篇《河渠书》，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可谓足迹遍南北。及至晚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成中国传统知识文人治学的准则。

我的老师乔志强（1928—1998）先生辈，虽然不能把他们看作传统文人一代，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却比吾辈要深切许多。即使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环境下，他们也会在自己有限的学问范围内走出校园，走向田野。乔先生最早出版的一本书，是 1957 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该书区区 6 万字，除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上谕、奏折、审讯记录稿本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采访当事人后人及“访问其他当地老群众”，召开座谈会收集而来的民间传说。也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他在教学之余，又开始留心搜集山西地区义和团史料。现在学界利用甚广的刘大鹏之《退想斋日记》、《潜园琐记》、《晋祠志》等重要资料，就是他在晋祠圣母殿侧廊看到刘大鹏的碑铭后，顺藤摸瓜，实地走访得来的。1980 年，当人们还沉浸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乔志强先生就推出了《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这部来自乡间田野的重要资料书，这批资料也成就了他对早年山西义和团的研究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历史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乔志强先生以其敏锐的史家眼光，开始了社会史领域的钻研和探索。我们清楚地记得，他与研究生一起研读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一起讨

论提纲著书立说，一起参观考察晋祠、乔家大院、丁村民俗博物馆，一起走向田野访问乡老。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被学界誉为中国社会史“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该书的长篇导论中，他在最后一个部分专门谈“怎样研究社会史”，认为“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方法”，举凡文献资料，包括正史、野史、私家著述、地方志、笔记、专书、日记、书信、年谱、家谱、回忆录、文学作品；文物，包括金石、文书、契约、图像、器物；调查访问，包括访谈、问卷、观察等等，不厌其烦，逐一道来，其中列举的山西地区铁铸古钟鼎文和石刻碑文等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和辛苦所得。

乔志强先生对历史调查和田野工作的理解是非常朴实的，其描述的文字也是平淡无华的，关于“调查访问”中的“观察”，他这样写道：

现实的社会生活，往往留有以往社会的痕迹，有时甚至很多传统，特别如民俗、人际关系、生活习惯，这些就可以借助于观察。另外还可以借助于到交通不便或是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的地区去观察调查，因为它们还可能保留有较多的过去的风俗习惯、人际往来等方面的痕迹，对于理解历史是有用处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二十多年后重温先生朴实无华的教诲，回想当年跟随先生走村过镇的往事，我们为学有所本亲炙教诲感到欣慰。

走向田野与社会，又是由社会史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20世纪之后兴起的西方新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在批判实证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年鉴派史学“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地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100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倡导的“新史学”与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80年代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更以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

历史”的雄心登坛亮相。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研究使得历史变得干瘪枯燥，以大人物和大事件组成的历史难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国情、把握国情，需要我们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历史、认识社会，需要我们还历史以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全貌。可以说，中国社会史在顺应中国社会变革和时代潮流中得以恢复，又在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得以演进。

因此，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又不仅是历史的社会，同时也是现实的社会。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此为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人物勒高夫曾宣称，年鉴派史学是一种“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半个世纪以前，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学术机构做演讲，有一讲即为“如何研究社会史”，他尤其强调：

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先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联系合一起来看。

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获取生动的实像。

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做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56页）

乔志强先生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部分，计有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结构、意义及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小节，谈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没有谈其学术意义，“重点强调研究社会史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史的研究要有现实感，这是社会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催促我们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动力。

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又是一种“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与传统史学重视上层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自上而下”视角不同，社会史的研究更重视

芸芸众生的历史与日常。举凡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农村、集镇、城市、士农工商、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节日礼俗、人际关系、教育赡养、慈善救灾、社会问题等等，均从“社会生活的深处”跃出而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显然，社会史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如此丰富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社会史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如此特性需要我们具有与此研究内容相匹配的相关学科基础知识与训练，需要我们走出学校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由此，人类学、社会学等成为社会史最亲密的伙伴，社会史研究者背起行囊走向田野，“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成为一道风景。

“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是有学脉缘分的，一位祖籍山西，至今活跃在人类学界的乔健先生 1990 年自香港向我们走来。我不时地想过，也许就是一种缘分，“二乔”成为我们社会史研究的领路人，算是我们这些生长在较为闭塞的山西后辈学人的福分。现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鉴知楼里，恭敬地置放着“二乔”的雕像，每每仰望，实多感慨。

1998 年，乔志强先生仙逝后，乔健先生曾特意撰文回忆他与志强先生最初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乔志强先生是在 1990 年初夏，当时我来山西大学接受荣誉教授的颁授。志强先生与我除了同乡、同姓的关系外，还是同志。我自己是研究文化/社会人类学的，但早期都偏重所谓“异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了台湾的高山族、美国的印第安人（特别是那瓦侯族）以及华南的瑶族。但从九十年代起，逐渐转向汉族，特别是华北汉族社会的研究。志强先生是中国社会史权威，与我新的研究兴趣相同。由于这种“三同”的因缘，我们一见如故，相谈极欢。他特别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吃的是我最爱吃的豆角焖面。我对先生的纯诚质朴，也深为赞佩。（《纪念乔志强先生》，未刊稿，第 32 页）

其实，乔健先生也是一位纯诚质朴的蔼蔼长者，又是一位立身田野从来不知疲倦的著名人类学家。他为扩展山西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初次与乔健先生相识正是在 1990 年

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上。1996年,“二乔”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我和一名研究生承担的“晋东南剃头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开始直接受到乔健先生人类学的指导和训练;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一个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我们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田野工作点赤桥村(即晋祠附近刘大鹏祖籍)被确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2006年下半年,我专门请乔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专题课,他编写讲义,印制参考资料,每天到图书馆的十层授课论道,往来不辍。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心一到两次,做讲座,下田野,乐在其中,老而弥坚。前不久他来又和我谈起下一步研究绵山脚下著名的张壁古堡计划。如今,乔健先生将一生收藏的人类学、社会学书籍和期刊捐赠中心,命名为“乔健图书馆”,又特设两种奖学金鼓励优秀学子立志成才,其情其人,良多感佩。正是在这位著名人类学家的躬身提携下,我结识了费孝通、李亦园、金耀基等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前辈及诸位同行,我和多名研究生曾到香港和台湾参加各种人类学、社会学会议。正是在乔健先生的亲自指导之下,我们这些历史学学科背景的晚辈,才开始学得一点人类学的知识和田野工作的方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气味,走向田野与社会成为中心愈来愈浓的学术风气。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命名为“田野·社会丛书”,编者和诸位作者不谋而合。丛书主要刊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为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修改稿,有些则为另起炉灶的新作。博士论文也好,新作也好,均为积年累月辛苦钻研所得,希望借此表达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追求。

丛书所收均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之作,而这个“区域”正是以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山西地区为中心。在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编者和作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认知:社会史的研究并不简单是“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才能实现“整体的”社会史研究这一目标,才能避免“碎片化”的陷阱。

其实,整体和区域只是反映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整体

只能在区域中存在，只有通过区域而存在。相对于特定国家的不同区域而言，全国性范围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的、整体的，但相对于跨国界的世界范围的研究而言，全国性的研究又只能是一种微观的、区域的研究，整体和区域并不等同于宏观和微观。史学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选题的整体与区域之别，区域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都是个别的、只适于局部地区的定论，“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的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我们相信，沉湎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研读品味先辈们赐赠的丰硕成果，面对不断翻新流行时髦的各式理论概念，史学研究的不变宗旨仍然是求真求实，而求真求实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去实践。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又往往被误认为社会史研究“碎化”的表现，其实，所谓的“碎化”并不可怕，把研究对象咬烂嚼碎，烂熟于胸化然于心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怕的是碎而不化，碎而不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绝不是画地为牢的就区域而区域，而是要就区域看整体，就地方看国家。从唯物主义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在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中保持整体的眼光，正是克服过分追求宏大叙事，实现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的重要途径。丛书所收的各种选题中，既有对山西区域社会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也有一些更小的区域（如黄河小北干流、霍泉流域），甚至某个具体村庄的研究，选题各异，而追求整体社会史研究的目标则一。

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必然逻辑。我们知道，传统历史研究历来重视时间维度，那种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大多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一个虚拟和抽象的整体，而没有较为真切的空间维度。社会史的研究要“自下而上”，要更多地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而区域社会正是民众生活的日常空间，只有空间维度的区域才是具体的真实的区域，揭示空间特征的“田野”便自然地进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走向田野从事田野工作便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与必然。

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也要重视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首先是对“异文化”的参与观察，它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

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人类学强调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直接到那个具体的区域体验空间的历史，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才能使时间的历史与空间的历史连接起来，才能对“地方性知识”获取真正的认同，才能体会到“同情之理解”的可能，才能对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有更为深刻的把握。然而，社会史的田野工作又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搜集资料、尽可能地全面详尽地占有资料，是史学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

如果说宏大叙事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正史资料所获取，那么，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传统的正史甚至包括地方志并没有存留下丰厚的地方资料，“地方性资料”诸如碑刻、家谱、契约、账簿、渠册、笔记、日记、自传、秧歌、戏曲、小调等，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有所发现，甚至大量获取。所以说，社会史的田野工作，首先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获取历史现场感的同时获取地方资料，在获取现场感和地方资料的同时确定研究内容认识研究内容。在《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开篇自序中，笔者曾有所感触地写道：

走向田野，深入乡村，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

值得欣慰的是，在长期从事社会史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走向田野与社会这一学术取向正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田野·社会丛书》所收的每个选题，都利用了大量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就单个选题而言，不能

说此前没有此类研究，就资料的搜集整理利用之全面和系统而言，至少此前没有如此丰厚和扎实。我们相信，走向田野与社会，利用田野工作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和资料，在眼下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是一种神圣的文化抢救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积累活动。我们也相信，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到的学术之“预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

走向田野与社会，既驱动我们走向田野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又激发我们关注现实将历史与现实粘连起来，这样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发现新材料和新问题，以此新材料用以研究新问题，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

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里还是有必要多谈几句。其实，何为“集体化时代”，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对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组、高级社，甚至人民公社等诸多说法。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农民走向集体化，实践集体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往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宏大叙事框架下的革命史和党史只能看到上层的历史与重大事件，基层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与实态往往湮没无闻。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随着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基层档案的迅速流失，从搜集基层农村档案资料做起，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我们社会史工作者一份神圣的社会责任。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21世纪初开始，我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气对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农村档案资料进行抢救式的搜集整理，师生积年累月，栉风沐雨，不避寒暑，不畏艰难，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迄今已搜集整理近200个村庄的基层档案，数量当在数千万字以上。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创办了一个“集体化时代

的农村社会”学术展览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可谓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其可惜之处在于它的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我们并不是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将这批档案视为“红色文物”期望它增值，实在是为其迅速散失而感到痛惜，痛惜之余奋力抢救，抢救之中又进入研究视野。回味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集体调查”，我们对此充满敬意而信心十足。

勒高夫在谈到费弗尔《为史学而战》时写道：

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1948年创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还使我们将社会史的研究引入到了现当代史的研究中。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所谓古代史、近代史范畴，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史，进一步丰富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以致开展“新革命史”研究的呼声，近年来愈益高涨。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史的研究仅限于古代、近代的探讨而不顾及现当代，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失和遗憾，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不仅是社会史研究“长时段”特性的体现，而且必将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进而促进整体社会史的研究。

三十而立，三十而思。从乔志强先生创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初步体系，到由整体社会史而区域社会史的具体实践，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到明清以来直至中国的当代史，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追求和实践中，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反思中不断前行，任重而又道远。

199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了。《田野·社会丛书》的出版，算是对这个年轻的但又是全国最早出现的社会史研究机构的小小礼物，也是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乔志强先生的一个纪念。

2012年岁首于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代序）

春风吹拂神州绿，年年岁岁话不同。连续八年的中央涉农“一号文件”今年聚焦在水利问题上，由此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对于我这样的史学工作者而言，除了关心现实的农村水利外，又不免思考着方兴未艾的水利社会史研究。

一、丰富的水利史料

正因为水利是关乎治国安邦的大事，中国传统史学历来不乏对水及水利事业的记载。自司马迁的《史记》立《河渠书》以降，“河渠书”、“沟洫志”、“食货志”乃至“五行志”成为记载有关水及水利事业的固定话语文本，《水经注》、《行水金鉴》等则是专门记录水利、治水、水利工程和水利事业的专书，“大禹治水”、“三七分水”、“水母娘娘”等各地不同版本神话般的传说在民间更是妇孺皆知，这些文献或口述的资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水利社会史最基本的资料。然而，传统史学对水及水利有着重记载而少分析，重罗列而乏综合的通病，仍然需要我们从现代史学的角度进行重新的审视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被视为农业的命脉，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视水利及水利工程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大中小水库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气吞山河的水利事业画卷。与之相应的是，学术界在中国水利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为主进行的对清宫档案，包括水旱、防洪、航运、灌溉等资料的整理，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等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不无遗憾的是，传统的中国水利史

研究成果或主流话语主要局限在少数水利史专家,研究的内容也主要限于水利工程和水利技术方面,仍然没有跳出治水的框架,姚汉源先生就自谦地认为,他的著作比较注意工程的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的关系,但远远不够,期望将水利视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进行全面而综合的研究。

二、水利社会史研究蒸蒸日上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回应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学术潮流中,水利社会史恰似一泓清泉喷涌而出,应运而生。概而言之,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这个区域社会是以水利为核心,进而涵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环境、社会生活等因素的综合有机体。水利社会史的内涵就是研究水利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研究视角的转换,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

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从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到现代社会,土地始终是生产资料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新中国史学研究中,土地所有制是一个被不断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并与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乃至中国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深度关联。其实,水及水利也是这样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度,在一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国度,无论丰水区,还是缺水区,水都牵涉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利用水、分配水、使用水、管理水、治理水,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水利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也是地方社会构成的重要渠道,水到渠成,水到之处也会形成不同利益的不同群体,不同群体都在“以水为中心”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以水为中心”可以作为一条线索探讨区域社会全面的历史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可以勾连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反映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历史。

三、跨学科综合研究水利社会史

水利社会史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水利”与“社会”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两个关键词,欲使水利与社会关联起来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必须突破“就水利而水利”,只重视水利工程和技术而忽略社会环境和因素的弊端,从全面的整体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角度去审视水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以水为中心,勾连环境、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资源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等社会生活变迁的方方面面,不仅需要研究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眼光和方法,这是水利社会史本身研究内容的复杂多面性决定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不仅需要吸取传统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甚至水利学的方法,更需要吸收近些年来社会史、环境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如此才能对水利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综合而全面的研究。

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需要走向田野与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是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趋向。社会史与人类学“优先对话”,是社会史追求跨学科方法的必由之路。历史人类学,或者说是“人类学化的历史学”,不仅提供了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前景,而且它所秉持的那种个案研究、野外考察、深描法、对日常实践或礼俗进行多功能分析的方法,都在丰富着我们的实践。水利社会史的魅力在于它激励我们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理解现实。如果说,有些学科,包括历史学的一些专门领域可以在书斋和图书馆做出一流学问的话,水利社会史这样的实证性学科脱离田野和实践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现实区域水利事业和状况都没有亲身体验,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怎样悬想和构筑出优秀的水利社会史著述来。重要的是,走向田野与社会,会使我们对历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研究对象有更多“同情的了解”,对文献资料有更为通达的读解,对地方性知识有更为亲身的感受,那些我们之前忽略或没有进入视野的水册、渠册、碑刻、庙宇、实物、契约、壁画、图形、家谱、笔记、传说等都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资料